

国学新知文库

詹石窗 主编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

郑志明 著

东方出版社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

郑志明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郑志明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6

(国学新知文库)

ISBN 978-7-5060-3856-0

I. 中… II. 郑… III. 葬礼-风俗习惯史-研究-中国
IV. K8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065 号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

ZHONGGUO BINZANG LIYIXUE XINLUN

郑志明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27.25

字数:35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3856-0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东邻日本。这场战争震惊了中华民众，许多学人开始质疑传

统文化的经国效用，转而羡慕西方文明的强势。20世纪初，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旧”热潮中，一些仁人志士忧心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问题，遂倡导整理国故，发掘国粹，如1905年2月23日创刊的《国粹学报》、章太炎创办的“国学讲习会”等均体现了此等努力方向。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设立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为国学热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2年1月，北京大学创建国学门，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国故”、“学术独立”的呼声中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根据地。其后，1925年9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诞生。这两大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延聘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为导师，汇聚文史哲的诸多一流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们办会编刊，著书立说，以维护中华学统为己任。学术先辈们的丰硕成果和弘扬民族传统的执著精神展示了一种思想境界，也为当今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提供了精神资源与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说任何一种计划都有特定文化因缘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厦门大学早期的国学研究传统乃是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的原初动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就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校长林文庆自任院长，并且敦聘久负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先生任研究院总秘书，张星烺先生、顾颉刚先生、鲁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来厦门大学之后，把国文系改称为国学系，拟以国学系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依托，把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连接起来。当时国学研究院设置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纺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

组、闽南文化研究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包括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方案等；还筹办两种刊物，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后来季刊只编好创刊号，没有出版，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创刊，实际出版三期，发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计划出版“国学研究院丛书”。可惜的是，由于校董陈嘉庚先生实业遭遇困难，经费紧缺，丛书出版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回顾历史，我每每被厦门大学早期那些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大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但也为当时“国学研究院丛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实施感到遗憾。多年来，学术先辈们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感召着我。于是，有一种愿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学术先辈的未竟之业，并且把他们的国学研究传统发扬光大。我思索着，追寻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经历了文化冬天的严寒考验之后，“国学”终于迎来了生机焕发的春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沉睡了数十年的“国学”研究重新被唤醒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神州大地的国学热潮逐渐复兴，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相继诞生。依托着这些研究机构，有关国学的研讨会、刊物、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在新国学热潮逐步形成的文化大背景下，我在惜别16年之后重新回到母校厦门大学。1998年，我开始负责哲学系“中国哲学”方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考虑最多的当然是怎样承袭和发扬沈兼士等前辈名家的国学研究传统，怎样进行学科建设的问题。从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尽管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可庆幸的是厦门大学领导给予有力支持，故而喜人的局面逐步形成。一方面，有关国学的研究机构，诸如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闽学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或者恢复加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有关国学研究的论著、丛书也陆续出版，例如《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道教医学》《儒家文化

与中国古代科技》《道韵》丛刊十二辑、《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系列丛书)、《哲学新视界》(系列丛书)等问世之后都得到了同行的好评。经过切实的努力,厦门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于2003年获得博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从而具有8个专业的博士点。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学、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也不断积蓄实力,全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20多个博士点,朝气蓬勃的学科群体与浓厚的人文氛围为新一轮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资源保证与精神支撑。

在兴趣、使命、学科建设需要的多重作用下,《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计划逐渐成形,并且见诸笔端。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陈寒节先生的来信,他询问我关于近来研究计划的一些情况,我将《国学新知文库》的主要选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经过几次电话联络和商讨,陈寒节先生告诉我可以将这套文库的出版计划提交出版社选题论证会讨论。不久之后,陈寒节先生通知我,人民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讨论通过了《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出版计划。欣喜之余,一种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敬佩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敬佩陈寒节先生的开阔眼界,感谢他的精心策划。

经过多方商讨与反复推敲之后,《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工作确立了如下宗旨:

第一,弘扬求实精神,鼓励学术创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具有求实精神,国学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就过程而言,国学研究的求实精神首先意味着对从事的领域展开广泛的调查,精读相关的经典文献,详细占有资料,然后进行深入思考,避免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中 say 无,而是依据事实,客观陈述,立论稳妥。这种求实精神在节奏加快的当今学术圈中尤其需要。与此相联系,《国学新知文库》也特别强调学术创新。往昔的成就固然可以引为自

豪，但重复劳动是没有前途的。唯有学术创新，才能永葆国学的旺盛生命力，焕发学术研究的青春。所谓“创新”就国学领域来说，首先是文献史料的新发现、新发掘；其次也在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选题，开展新的分析等等。古人称“天地日新”，又谓“革故鼎新”，此类格言成语说明我们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本来就非常提倡创新。在新的时代，尽管所谓“新”的标准不同，但先民们倡导创新的精神却依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在国学研究工作中认真思考和发挥。

第二，扩展文化视野，兼蓄古今中外。从研究资料来说，我们不仅要熟悉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田野信息、考古资讯以及国内前贤时仁的论著，还要有世界眼光，努力掌握国外同行的学术动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海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在文化学术传播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了解他国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就可能步他人之后尘，重复无谓的劳动，甚至陷入迷乱状态，徘徊不前；唯有高瞻远瞩，放眼全球，关注他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并且认真加以分析和借鉴，才能扬长避短，超越学术瓶颈，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关注薄弱环节，培植研究特色。经过长期的努力，国学研究在总体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往许多人谈国学，常常把它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内。其实，此等视野是相对狭窄的。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导向问题，国学研究未能在比较广阔的领域展开，故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不仅要继续关注儒家学说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而且将加强对国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的探究，比如道家、道教之学、古代科技哲理、传统经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都是以往的国学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多加鼓励。从发展的立场来看，“强势”与“薄弱”本是相对而

言的。当人们对于某个领域、某种专题不太关注而没有投入足够力量加以研究的时候,该领域或专题就是一种“薄弱环节”,而当人们对这种“薄弱环节”有了足够重视的时候,“薄弱环节”就可能转化为“强势环节”。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可以化“薄弱环节”为“强势环节”,而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培植新的特色。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精神领域而言,大多数人却依然主张文化多元化,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保存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弘传一方文化”,既说明世界范围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也意味着文化“个性”乃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曾雄踞世界东方,其中蕴涵的精神宝藏,特别是人文资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可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术界主流倾斜于吸纳西洋、东洋文明,以追随西方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时髦,热衷于做西学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却逐渐远离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我们认为,富有情操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宽广的胸襟和视野,敢于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应该坦然地开启心扉,理直气壮地为发掘国学的积极资源而大胆探索,奉献力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已经登上国际文化舞台,正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平等对话,而且成为我国腾飞的强大精神载体,从而被西方世界所关注。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George Sarton)说:“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

到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① 萨顿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也是富有启迪的。

胡适曾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过：“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这是因为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因应了时代的需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我们希望《国学新知文库》也能切近时代脉搏，在新一轮国学春潮到来并且逐步高涨的时候推波助澜。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2006年10月10日

^① [美]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0—141页。

自序

殡葬是人类社会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生命礼仪,是集体性的生存经验与心理活动,在面对死亡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对智慧。此一智慧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伦理。前者提供殡葬礼仪的精神观念,以形上的生命体验来安顿人们的存有需求,后者提供殡葬礼仪的操作场域,重视人际间相互交际的生活规范。殡葬礼仪学是以人性为本位的文化教养,肯定生命向善自我实践的道德意志,以及开拓出与宇宙整体和谐的心灵境界。

殡葬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是源起于远古社会的灵魂观与死后世界观,发展出维系家庭孝道伦理的礼仪规范,着重在生者与亡者之间慎终追远的礼节制度与道德规范。殡葬礼仪是人类数千年来生存智慧的长期累积与发扬,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与完备,体系相当庞大与多元。这种处理死亡的生命礼仪,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不应被忽视或舍弃,应是人们生命尊严的价值的再实现,更需要培养出较高水平的道德修养与伦理关怀,以殡葬礼仪来善待亡者与抚慰生者。

殡葬礼仪肯定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形式外还有人性的精神存有,发展出尊重人性的观念体系与礼仪制度,肯定自我生命的自觉体证与终极实现,关怀临终时生命的自然权利,重视对临终者心理与人性的照顾,是相应于当代安宁疗护的服务精神,由物质治疗转向精神照顾,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也关注对丧亲者的悲伤抚慰,纾解各种失落情绪与悲伤情怀,教导人们勇于面对因死亡所带出的种种生存挑战。

郑志明 于北投辅仁书房

2009年8月12日

目 录

总 序	詹石窗	1
自 序	郑志明	1
第一章 绪论:殡葬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1
一、前言		1
二、殡葬礼仪源于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		2
三、灵魂的归宿世界		10
四、死后世界与殡葬礼仪		18
五、结论		27
第二章 殡葬礼仪的范畴与流变		29
一、前言		29
二、殡葬礼仪的定义与发展		31
三、殡葬礼仪的种类		36
四、殡葬礼仪的礼义		47
五、殡葬礼仪的流变		56
六、结论		62
第三章 殡葬礼仪的内涵与流程		64
一、前言		64
二、殡葬礼仪的文化内涵		65
三、殡葬礼仪流程		72

四、殡葬礼仪的文化功能·····	86
五、结论·····	93
第四章 殡葬礼仪的丧葬制度 ·····	95
一、前言·····	95
二、自古以来的各种葬式·····	96
三、各种墓葬制度·····	106
四、各种随葬物与明器·····	118
五、当代丧葬制度的走向·····	125
六、结论·····	131
第五章 殡葬礼仪的丧服制度 ·····	133
一、前言·····	133
二、丧服制度的形成·····	134
三、台湾的丧服制度·····	145
四、丧服制度的文化功能·····	153
五、结论·····	159
第六章 殡葬礼仪的丧书与司仪 ·····	161
一、前言·····	161
二、古代殡葬文书的体类·····	164
三、当代殡葬文书的体类·····	171
四、殡葬礼生与司仪·····	179
五、当代殡葬丧书与司仪的专业涵养·····	187
六、结论·····	193
第七章 殡葬礼仪的宗教祭祀 ·····	195
一、前言·····	195
二、儒家的殡葬祭礼·····	196
三、佛教的殡葬祭礼·····	203

四、道教的殡葬祭礼	211
五、民间殡葬祭礼的会通走向	220
六、结论	229
第八章 殡葬礼仪的生死信仰	231
一、前言	231
二、原始社会的生死信仰	232
三、生死信仰的四大主题	237
四、各种生死信仰的加入	247
五、当代生死信仰的发展危机	255
六、结论	261
第九章 殡葬礼仪的悲伤抚慰	263
一、前言	263
二、殡葬礼仪的抚慰功能	265
三、殡葬礼仪对临终者的悲伤抚慰	273
四、殡葬礼仪对丧亲者的悲伤抚慰	280
五、殡葬礼仪对丧亲者的后续抚慰	286
六、结论	292
第十章 殡葬礼仪的临终疗护	294
一、前言	294
二、殡葬礼仪与临终关怀	295
三、殡葬礼仪与安宁疗护	303
四、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的结合	312
五、结论	324
第十一章 殡葬礼仪的生命伦理	326
一、前言	326
二、殡葬礼仪的伦理原则	328

三、殡葬礼仪在生命伦理上的扩充	340
四、殡葬礼仪的生命伦理功能	349
五、结论	357
第十二章 殡葬礼仪的意义治疗	359
一、前言	359
二、临终礼的仪式意义治疗	361
三、丧礼的仪式意义治疗	372
四、祭礼的仪式意义治疗	381
五、结论	390
第十三章 殡葬礼仪的发展趋势	392
一、前言	392
二、当代殡葬礼仪的发展困境	394
三、当代殡葬礼仪的文化再造	403
四、当代殡葬礼仪的发展愿景	411
五、结论	421

第一章 绪论:殡葬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一、前 言

人类文明是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历经数十万年集体自发性的创造,反映出长期生命活动中的存有愿望,产生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观,以及如何处理死亡的殡葬文化。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已有丰富的生命观与殡葬文化,进入到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与人文社会,依旧传承着古老的生命观与殡葬文化,延续着人与宇宙一体化的信仰观念,在有限的生存时空中建立起永恒的精神世界,体悟到人的生命有着与天地相互融合的内在性与创造性,是超越自身生物本能的精神性存有。如此精神性的生命观,是经过世代传承长期累积而成的集体观念与实践活动,肯定人性是可以会通于宇宙的超越性与永恒性,在灵魂不灭的观念下发展出安顿死亡的殡葬文化。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早期人类原始思维的模式进行理论性的分析,追究人类对自我生命的理解过程,探讨人如何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中建构出观念性的精神世界,超越出外在的物质环境发展出优化的生存时空。在这种求优的强烈意图与具体实践下,人类早已意识到不同于肉体形态的本善人性,肯定人性是主宰与支配生命的主体存有,此人性有的称为灵魂或灵性,是内在于人的精神性实体,是相通于天地万物的存有之理,发展出最早的原始宗教文化,教导人们如何经由与超自然力量的沟通方式来安身立命,进而能提高自我的精神能量与生命

境界,殡葬文化正是这种生命观实践而出的求优行为,是顺着生死信仰而来的优化生存活动。

这种优化生存环境的追求,是来自于原始社会集体共有的宇宙观念,肯定人与自然有着相互融合的精神能量,人与天地万物存在着和谐的共通本性,在如此人性论的认知与追求下,人类一直是处在不断善化的生态环境之中,这种生态环境在人文社会以前早已成型,是史前时代人类自发而成的生命观念与生活文化,是集体思维能力高度发展的产物,虽然称为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却是人类最早成型的精神文明系统,是自我意识长期进化与成长的观念与实践体系。殡葬活动可以说是人性自我实现下的文化形态,追求人与宇宙相互和谐与沟通的种种交际管道,肯定生命是可以超越死亡而永远不朽,虽然肉体终究会衰老与死亡,但是人性是可以超越物质形态而永存。

二、殡葬礼仪源于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

人类异于动物在于其特有的思维能力,来自于人脑内部高级的自我运动,不是单靠人脑外在的物质形式,更仰赖的是生命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是人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与认知,是经过长期对信息的接受、加工与储存,以及对信息进行再创造的能动历程。人脑成为思维的主要器官,除了其自然的生理基础外,更重要的是人主体性的生活实践,开拓出人际互动下的社会性思维成果。人类的思维能力是一种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与作为思维主体的人的语言能力、文化知识与自我意识等水平是密切相关^①,是经过一代一代漫长的传递与积累的过程。

^① 夏甄陶、李淮春、郭湛主编:《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